

# 文本的世界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杨大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杨大春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

(后现代思潮丛书)

ISBN 7-5004-2220-2

I. 文… II. 杨… III. 结构主义 (哲学) - 概论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11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8.00 元

# 目 录

前言.....	( 1 )
第一章 科学的迷梦.....	( 5 )
第一节 语言的回归.....	( 5 )
第二节 结构的观念.....	( 24 )
第三节 诗学的理念.....	( 42 )
第二章 解构的踪迹.....	( 62 )
第一节 思潮之确认.....	( 62 )
第二节 解构的特征.....	( 71 )
第三节 代表性人物.....	( 87 )
第三章 话语的自足.....	( 111 )
第一节 方法论的变革.....	( 111 )
第二节 话语的凸现.....	( 122 )
第三节 话语构成论.....	( 138 )
第四节 考古与谱系.....	( 149 )
第四章 解构的运作.....	( 167 )
第一节 批评与寄生.....	( 167 )
第二节 文本的愉悦.....	( 184 )
第三节 哲学的命运.....	( 205 )

第五章 知识的分化.....	(225)
第一节 秩序的观念.....	(225)
第二节 相似的时代.....	(236)
第三节 表象的时代.....	(248)
第四节 现代知识型.....	(262)
第六章 主体的黄昏.....	(290)
第一节 人学的迷梦.....	(290)
第二节 主体离心化.....	(309)
第三节 主体的真相.....	(330)
第四节 漂泊的主体.....	(361)
结语：吾谁与归.....	(368)
参考书目.....	(374)

# 前 言

本书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论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重点则是后结构主义。人们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论述和分析角度。事实上，由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复杂关系，由于各自内部的分歧，我们很难明确区分两者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清理。我们采取整合与分化相结合的方式，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概述。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罗兰·巴尔特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同时辅以耶鲁学派的想法。根据各章各节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我们将分别以某一个或某几个人为主展开论述，其间的不平衡是显然的。

第一章重点分析语言学革命及其对结构主义的意义。我们将一般性地探讨语言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并具体地分析结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一些观念，尤其是对结构主义的文学科学理想的影响。结构主义既有理论建构，又有非常细腻的技术分析，我们在本章中主要论及一般原则。

第二章通过比较分析来概述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涉及理论建树与游戏倾向之间的关系，我们将突出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性、开放性、跨学科性、概念独特性。而且，我们将概要地介绍各位代表人物的情况。考虑到后面都是专题性论述，不会言及每一个人，这不失为一种补救。

第三章探讨的是福柯有关话语的理论，我认为我们可以

在这里寻找到解构的基础。人们大多倾向于关注福柯的具体分析，殊不知，他的理论总结不仅是他自己的工作，而且是整个后结构主义的工作的最完整阐释。当然，福柯与其他人差别很大，而且自己也在不断改变看法，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第四章是对解构的操作方面的具体分析，涉及德里达、罗兰·巴尔特和耶鲁学派的米勒、德·曼等人。关于寄生现象的探讨可以使一般性地了解解构批评与传统批评的不同，而具体文本分析则可以使我们领会到解构的独特魅力，我们进而可以在解构的视野中看待哲学在 20 世纪的命运。

第五章涉及的是后结构主义视野中的知识观。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消解了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界线，在福柯那里进而探讨了社会文化领域内科学思维的多样性与分化。为了抑制唯科学主义倾向，福柯探讨的是普泛意义上的知识（Savoir，主要是人文知识），而不是狭义的知识（Connaissance，尤指科学知识）。

第六章论及“主体的终结”这一受到广泛关注的主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但还是有一些差异，实际上往往表现为同一个人在结构主义时期和后结构主义时期之间的不同。我们将谈到罗兰·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的有关论点。罗兰·巴尔特和福柯的分析较为系统，德里达则带有强烈的游戏色彩。

我们将在结语部分简单地谈谈对待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思潮的态度，这是一个应该谈一谈，然而言人人殊的问题。事实上，作者的一些带倾向性的想法已经渗透到整个作品中，这一结语完全是出于形式上的考虑，也可以说是尊重习惯，但愿不被看作是画蛇添足之举。

这本小书是在近年来完成的一些习作的基础上写成的。

尽管本人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原先也以为自己在有关问题上有一些心得，但是，真正动笔写作时却老是感到力不人心，时有搁笔的念头。现在虽然完稿，却不知读者能否接受。一个小插曲有助于说明我的担心。初稿写就后，因自己电脑输入不熟练，除朋友帮忙输入一部分外，还出资让人输入了一部分，最后由自己在电脑上修改。让我感到惊异的是，电脑屏面上老是出现“伤口”和“创伤”字样。用过五笔字型输入法的人都知道，“伤口”和“作品”、“创伤”与“创作”是同码字。实在是太巧了，它们让我在这一戏剧性的小插曲中对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观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或者说为之找到了佐证。我深知拙著的局限，她满是“伤口”，多有“创伤”，但愿她能承受读者挑剔而锐利的目光。

在拙著付梓出版之际，我非常感谢贤妻王建文，她对我的工作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为了写作是书，我不得不取消了早就许诺过的旅游结婚计划，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拙著写作的时候，也是我们参与永恒的生命轮回之流的时候，我未能抽出时间陪伴她渡过难熬的时光，相反，她默默地操持家务，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的写作环境。由于有了这样温柔贤慧的妻子，我的书稿得以顺利“分娩”。她也一定是一位良母，我们的小天使在娘胎和出生后都将由于她而健康成长。我还要感谢许多师友对我的生活和学业的关心，感谢邢忠先生、许丽萍小姐提供的帮助。我尤其要感谢冯春风小姐为拙著及其所属丛书付出的劳动和精力，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丛书的心意。

杨大春

1997年10月

# 科学的迷梦

## 第一节 语言的回归

### 一、语言与思想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既有断裂，又有连续，共同构成了一场渗透到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符号学，史学理论，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广泛而持久的运动。然而，我们很难完整地清理它们与各门具体学科的关系。原因在于，各位结构主义者尽管都有各自专门的学科领域，但他们的目标不限于此，他们往往涉及到众多学科，且试图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某种具有普遍特征的东西，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跨学科性和互文性；而后结构主义者尤其主张取消学科界线，在文本游戏中学科分类趋于消失。

就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理论倾向，一种科学努力而言，我们可以暂时忽略各门具体人文学科的具体性，而集中于其最有影响的方面：即带有哲学倾向的“结构观”和它的“文学



科学”努力，各具体学科只被当做背景。就后结构主义消解作品界线、学科界线而言，我们仅把不同学科考虑为文本的体现。各学科自身的演变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事业无疑会有影响，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语言学这一学科。我们在谈到具体思想时，将会涉及各相关学科，但在目前的工作中，首先要突出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语言学背景。事实上，结构主义接受并得益于一种语言学模式，后结构主义是这一模式的极端化。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渗透到人文哲学与人文科学中的思潮，而语言学与人文哲学、人文科学具有较为复杂的牵连。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古希腊的本体论阶段、近代的认识论阶段和现代的语言学阶段，分别表现为对始基的性质、认识的性质和语言的性质的重点强调，表明各个阶段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思想的对象是不同的。当然，不是说各阶段之间就没有丝毫的共同性，而是说有些问题被看作是自明的，也就没有给予明显的重视。各阶段之间的演变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在此不打算一一清理，只考虑后两者间的关系。

福柯的分析对我们很有启发。他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人文科学，着重强调了语言学变迁对人文科学的决定性意义。按他的看法，古典时期，人们根据同一与差异原则追寻事物的普遍秩序，这种秩序不是指事物的自在的本有的秩序，而是思想所制定的用来规整事物的先天媒介，秩序处在观念之中。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它们在其间可以被认知的方式。古典知识受制于普遍秩序，每一门学科都是关于秩序的科学，或者说受制于同样的秩序观念，因此不存在严格的学科分化。在这里，人们重视的是表象分析(Analysis

Of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人们根据观念的秩序进行同一与差异的比较和分类,在此语言是一种透明的工具,是完整的未分化的东西,它就是表象本身。古典哲学与其它学科一样是表象分析,因此语言、思想、表象互不分离。

自19世纪以来,伴随表象式微,语言分化了。这是因为按康德的观点,只有经验的领域是可以被表象的,超经验的东西是不能被表象的。语言的透明性于是丧失了,它不再只是一种工具,它也成了有待破译的一种认知对象。福柯认为,语言的分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言可以继续充当表象的工具,但是越来越向形式化方向发展,其明显的表现是在数理学科中。

其次,语言越来越与阐释性的学科相关,具有一种批判价值、具有某种历史沉淀,它导致各种阐释技巧在19世纪的复兴。

第三,语言分化的最重要也是最未料到的方面,乃是文学(文学本身)的出现。这里的“文学本身”概念十分重要,文学无疑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但福柯在此强调的是只体现语言之生命而不外求的文学——不及物的文学,他写道:“文学越来越变得与观念的话语相疏离,并把自己密封在一种根本的不及物性中。”<sup>①</sup>这与罗兰·巴尔特的看法是一致的,后者也认为从1850年以后,文学越来越成为语言问题。

总之,语言不再是一个透明的独立自存的一个整体,不再是一面等待使用的镜子,相反它以分化的方式存在,对语文学家,形式化者,阐释者,写作者各各不同。这样一来语言似乎退出了思想舞台,被各门具体的学科所吞噬。如语文

---

① M. Foucault : The Order Of Things, p300.

学完全成了不关思想的技术分析，文学也不再表现、不再表达，成为纯粹的关于形式的技巧。

按福柯的看法，语言在 19 世纪的确与哲学失之交臂。哲学家们更多地在劳动和生命中寻找对象，建立起实践哲学、生命哲学，却很少注意语言问题。语言的分化与人文科学的诞生联系在一起：表象的式微导致语言的分化，也导致“统一的普遍的秩序科学”的失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化了。自然科学维护语言的表象功能，以其强烈的认知意志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形成了独特的霸权，然而自然科学并不能够为人们确立价值准则，往往导致精神危机。人文科学于是作为关于人的精神、文化的科学而诞生，其目标指向是价值的，但言人人殊。自然科学的研究力求一致，人文科学的研究则充满分歧和差异。这就要求某种统一的努力。自然科学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越来越受到语言的鼎力帮助，人文科学为结束纷争、混乱可否有某种依靠？结构主义之兴起似乎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它只是一个后来者。

按照福柯的看法，古典时期语言作为表象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人消融在了无边的秩序中，19 世纪语言分化，学科也大部分分化了，于是人作为一种维系力量出现，各门人文科学实为入学。但是到 19 世纪晚期，语言再度升位，于是人不得不再次退出。尼采作为现代思想的反叛者，提出了语言重新回归思想领域的问题，“直到 19 世纪末，语言才直接地，以其自身的权利回归到思想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语文学家尼采第一个把哲学的任务与对语言的根本反思联系起来，则要在 20 世纪才会出现这种回归。”<sup>①</sup>也就是说，语言

①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p305.

的分化导致语言与思想的分离，而现在由尼采打头阵对语言加以反思，是要让语言重新统一并回归思想。玛拉美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福柯认为，玛拉美终身致力于将语言的片段存在再度限制在一个或许不可能的统一体中，“玛拉美的计划——把一切可能的话语封闭在词语的脆弱的密度中，在墨水留在纸上的物质性黑色线条中——根本上是对尼采向哲学提出的疑问的一种回答。”<sup>①</sup> 尼采要问谁在说话，他多少还是以话语的拥有者为聚焦点，而在玛拉美那里则转换为这一回答：“在其孤独之中，在其脆弱的振动之中，在其虚无之中说出的是词本身，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其谜一般的、不稳定的存在。”显然，玛拉美以“什么是语言？”取代了“谁在说话？”。20世纪思想的根本状况正是如此：哲学、人文科学都围绕语言问题而展开。福柯这样断言道：“我们当今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很可能从未跨越尼采的问题和玛拉美的回答。”<sup>②</sup> 在古典时期，语言的表象功能使语言与思想直接等同，两者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疑问。在19世纪，由于语言的分化，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语言本身，无法提出何为语言这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19世纪末期，发生了变化，伴随尼采和玛拉美，思想再度与语言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问题也就再度出现。

十分显然的是，按照福柯等人的看法，在思想界和各个入文学科领域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统一的努力。尼采的问题、玛拉美的回答获得了广泛的反响。人们力图从语言学入手，因为语言的命运与人文学科最密切相关，语言成

---

① M. Foucault : The Order Of Things, p305.

② M. Foucault : The Order Of Things, p306.

为寻求理解人文精神现象的钥匙。人文科学是语言分化的产物，要揭开这些学科的秘密，就必须回到语言自身的生命中去，这实际上赋予语言以本体地位。20世纪在哲学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就是要根据语言学的革命来重新理解人文科学的根本处境。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包括分析哲学都是让语言回到思想中的尝试。

解释学本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更多地与语文学而不是语言学联系在一起。它本来与一种类似于训诂、评注的技巧有关。它要么针对法律文本，要么针对圣经文本。后来，施莱尔马赫将它发展为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理论，狄尔泰将它看作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至此解释学有了系统的性质，但仍然局限于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在20世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将之本体论化，提出了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说他对语言的解释只是为了指出这一现象在存在的此在状态中的本体“处所”，“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展开状态这一存在论状态中有其根源。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言谈……言谈同现身、领会在存在论上是同样始源的。”<sup>①</sup>语言显然具有本体地位。伽达默尔认为人们尚未注意到语言的本真的存在，“语言性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接近我们的思想，而在它发挥作用时又是这样少地成为我们的对象，以致它对我们隐藏了它自己本真的存在。”<sup>②</sup>他自己的工作则是将之提升到这一地位。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不管是在海德格尔，还是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都没有提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的观点。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96页。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85页。

从“效果历史”和“视界融合”的观点看，语言尽管不是透明的，是有自己的密度的，但它依然与表达思想的任务联系在一起。语言地位的突出并没有消融主体和历史的主宰，伽达默尔写道：“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中的‘解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sup>①</sup> 此在的在场性使语言仍然受制于“人类学”。

结构主义是索绪尔开启的语言革命的高潮。在它看来，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语言的性质，因此可以分享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这不是仅仅把语言作为工具，而是说它们事实上是一致的，都构成为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内容。詹姆逊这样评论道：“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论上享有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sup>②</sup> 于是它力图以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重新思考一遍。在结构分析中，语言的本体地位消融了人，于是出现了“主体离心化”。

后结构主义同样关注语言问题，但看法却完全不同。罗兰·巴尔特在其晚期不再建构符号学，而是提出了一种符号分裂学，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已经消失，我们面对的是纯粹的能指游戏。随着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他偏离了语言学模式，不再以语言学作为文学科学的范本，而是看到了语言学的权力方面，这与福柯关于话语权的有关看法是一致的。权势总寄寓于语言中，或者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他在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6页。

②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第2页。

1977年作的《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讲道：“全部语言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这样，冲破语言规则的片断化，恋人絮语般的解构努力取代了普遍结构的科学分析。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探讨文本，但他关心的是文本的断裂和张力，而不是其类似于语言的结构。德里达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语言问题在当代思想中的渗透力，他在《论文字学》中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去考虑这一话题，语言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种。但它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达到如此地侵入到最多样的研究和最异质的话语的（在其意图、方法和意识形态上是多样的和异质的）普遍水平。”<sup>①</sup>他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语言”一词的贬值，是一种廉价的诱惑，是一种被动地向时尚效忠，可以说是先锋意识，也可以说是无知。当然这也表明了符号本身的通胀，表明了语言能指对于所指的无限增加的游戏。德里达本人仍然关心语言问题，但他更加关注书写而不是声音，主张“声音之死”和“书写之兴”。

语言回归思想应该说是20世纪哲学的普遍主题，分析哲学对语言的重视及其开启的“哥白尼革命”同样引人注目。分析哲学家们以逻辑分析来限制哲学的功能，认为哲学就是逻辑分析，或者说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由于语言的界限构成为世界的界限，语言就成为本体性的东西，而传统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也就应该寿终正寝。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逻辑哲学论》的意义概括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这意味着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而这条界线只能在语言中划分。<sup>②</sup>早期维特根斯坦、罗

<sup>①</sup> J. Derrida : Of ammatology, p6.

<sup>②</sup>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20页。

素等人关注的是形式语言(人工语言,理想语言),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摩尔等人则转向关注日常语言,语言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人文哲学、分析哲学都关心语言问题,足以看出语言地位的突出。我们在本书中只涉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关系,它们是语言学转向的集中体现。

## 二、结构语言学

如上所述,社会文化现象之研究应当以语言学为榜样,语言学也可以充当这种作用。但是,这里不是泛论语言学,尽管任何语言学于这种研究都有教益,但是,结构主义要以之为模式的是结构语言学,正是结构语言学实现了语言学的真正变革。

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写道:“结构主义者认为有用的概念和方法,其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当中只有五、六位语言学家可以称得上发挥了独创性影响的人物。”<sup>①</sup>这里有两个线索,一是欧洲的,一是美国的。

欧洲线索的关键人物当然是索绪尔及其弟子,他们把语言(La Langue)而不是言语(La Parole)作为研究对象,他们集中精力对语音系统进行描写。俄国形式主义对诗语的研究是有教益的;以雅各布逊(Jacobson)和特鲁别茨科伊(Trubetzkoy)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实现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音位学革命”;而以叶姆斯列夫(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语言系统的形式本质,致力于所谓的语符学(Glossematics)研究。欧洲结构语言学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些

<sup>①</sup>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27页。



派别，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英国学者霍克斯写道：“描写的、功能的、语符的，构成 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分析的主要模式。”<sup>①</sup>

在美国线索中，主要是博厄斯 (Boas)、萨皮尔 (Sapir) 和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的结构语言学的独立发展。此外，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值得重视，尽管他在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发挥过作用，但对后结构主义影响很大，而且，他关于天赋能力和深层结构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结构主义。

按照索绪尔的看法，在他自己的语言学之前语言学有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

最先是所谓的语法 (Grammer)，以波尔—洛瓦雅尔 (Port—Rovayal) 唯理“普遍语法 (General Grammer)”为代表。索绪尔评价说，“它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对于语言本身缺乏科学的、公正的观点，它的惟一目的是制订出一些规则，区别正确的形式和不正确的形式。”<sup>②</sup> 强调规范性，但尚未引入严格的科学观察是唯理普遍语法的基本特点，它明显地受到笛卡尔的影响，这也映现出福柯所谓的古典时期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秩序的知识这一看法。

第二阶段出现的是语文学 (Philology)。语文学首先要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同时还引导它去从事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等的研究，到处运用自己的方法，即考订。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缺陷是只注意书面文字，忘却了活的语言。<sup>③</sup> 它只留意希腊、拉丁古文献，而不去关注新材料。

① 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 23 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7 页。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8 页。